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ronzes as Ritual Vessels in the Erligang Culture Period: A Case Study of Panlongcheng

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的礼器特质 ——以盘龙城材料为例

张昌平 Zhang Changping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武汉, 430072

陈丽新 Chen Lixin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 430077

内容提要:

古代中国青铜器多是用作礼器并在西周中晚期形成了成熟的器用制度, 成为早期国家社会阶层的物化标识。不过, 器用制度有一个走向成熟的过程。二里头文化时期, 青铜器开始有了规模化生产, 贵重的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质开始显现。二里冈文化晚期, 青铜器器物的数量和类别大大增加, 说明青铜器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此时青铜器中觚、爵、斝为形式的组合形成, 并以不同套数的组合标识等级高低; 同时, 青铜器还以体量的大小标识等级的高低; 装饰也成为礼器重要程度的标志。总的看来, 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以组合方式、数量与体量、装饰等形式, 来表达礼器的特质。这样的形式, 也基本就是西周中晚期器用制度成熟期的方式。这说明二里冈文化晚期, 青铜礼器的外在表达形式基本成形, 青铜器作为社会最重要礼器的地位已经形成。

关键词:

礼器 礼器制度 二里冈文化 盘龙城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bronzes were mostly used as ritual vessels and the mature bronze-based rituals had come into being after a long process in the mid-to-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which became the materialization symbol of the social class of the early 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Erlitou Culture, both the scale production of bronz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cious bronzes as ritual vessels began to emerge. In the late period of Erligang Culture,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bronz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dicating that the bronze production had got a great development. In this period, *gu*, *ju* and *ja* appeared in the combination form, and different numbers of combination sets represented different ranks. At the same time, the size and weight of the bronzes indicated the grades and the decoration had become a symbol of the importance of ritual vessels. In general, the bronzes in the Erligang Culture period expre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tual vessels in the forms of combination mode, quantity, size, decoration, etc. These forms are basically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maturation stage of the bronze-based rituals in the mid-to-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It shows that the external expression mode of bronze ritual vessels in the late Erligang Culture period was basically formed and the bronzes had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ritual vessels in the society.

Key Words: Ritual vessels; bronze-based ritual system; Erligang Culture; Panlongcheng

商周时期青铜器多是用作礼器、以表达等级为内在特质，并在西周中晚期形成了成熟的礼器使用制度，不但成为早期国家社会阶层的物化标识，还对古代中国礼仪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自郭宝钧先生阐述礼器制度的变化以来^[1]，对于青铜器的礼制性质研究，一直都为学者们所重视。不过，礼仪活动在古代社会有着很早的渊源，以饮食器皿作为礼器表达社会等级的外在形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质也是早就存在。显然，在西周中晚期以鼎簋为核心的礼器制度形成之前，青铜器作为礼器的器用方式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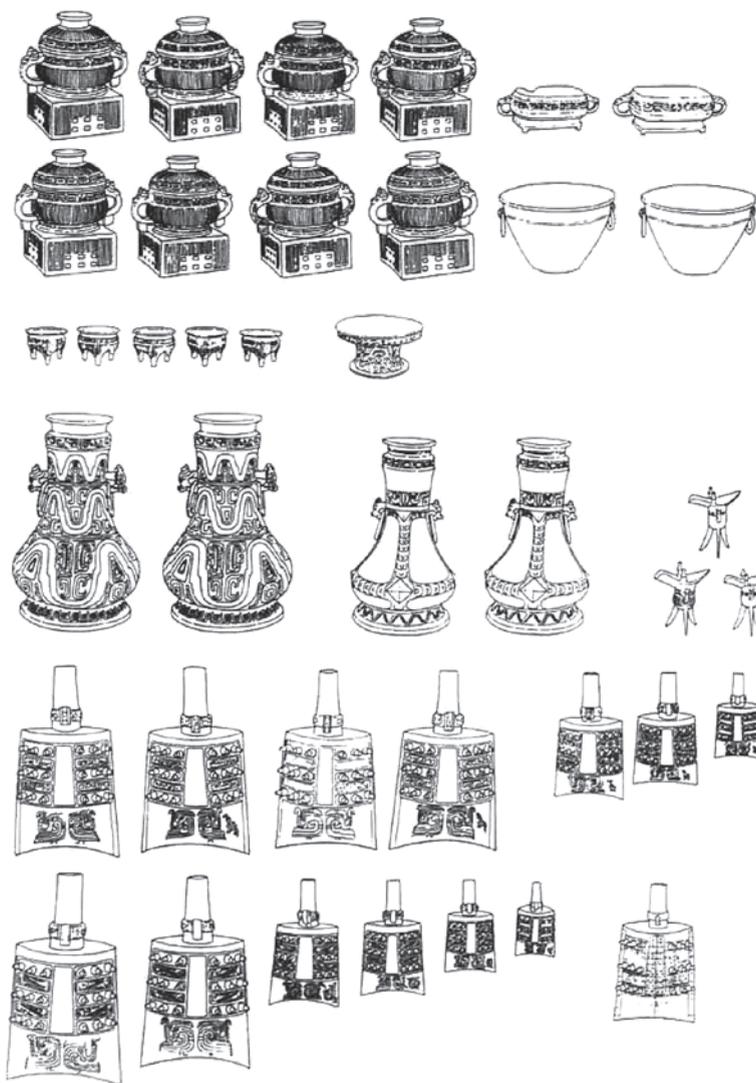
青铜器如何作为礼器进行运作并不断制度化？观察一过程，是研究器用方式的演进、揭示早期国家礼制形成的重要视角。另一方面，早期国家中作为礼器的青铜器，以外在的形式表达社会上层人群的等级和地位，又是考古学研究中考察当时社会阶层及其变化的重要路径。以下以青铜器生产得到高度发展、文化区域十分广袤的二里冈文化时期为例，从盘龙城墓葬材料入手，来进行考察。这样组织材料，是因为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郑州考古发现有限，而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无论是数量还是等级都更为丰富，基本能够代表不同的阶层。

一 礼器与礼器制度

所谓礼器，简而言之就是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器具往往不重视功能上的实用性，而追求形式上的仪式感，以表达使用者财富、地位乃至权力等要素。礼器制度或曰器用制度，是强制性地规定礼器的使用方式，从而使地位或等级的体现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和普遍性。礼器制度是礼仪制度（礼制）的物化形式，一旦礼器制度形成，则说明早期国家已经步入较为成熟的阶段。因此，礼器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礼器使用（器用）走向成熟，是器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形式。以下我们以礼器制度成熟的西周中晚期和青铜礼器初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为例，对比二者的异同。

礼器制度特质在西周中期晚段就已经开始成形，并在其后趋于成熟。青铜器以鼎、簋、壶、盘、匜成为一种基本固定的礼器组合，鼎、簋搭配最为常见，奇数的鼎成列、配之以偶数的簋，壶以及盥、篚等成对，组合中除盛酒的壶之外，其他酒器已很少见，而编钟在高等级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2]（图一）。如果总结西周中晚期的礼器制度，有如下两点值得提出：其一，以组合的复杂程度、鼎簋的量度（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来体现礼器的级别。其二，相同的器类、甚至是不同的器类可能装饰相同的纹饰，纹饰构图简单，常以连续重复的排列来完成一周完整的装饰。处理相同的器形，越来越多地使用分铸和焊接，铸造技术趋于简化，铸造痕迹常常不加遮掩地暴露于器表。从图一所见，这种器用的表达方式本身，就展现出一种秩序感。因此，成熟制度下的礼器实际上就是量度化，礼器的呈现已经程式化。

二里头文化时期，铜器包括铜容器已经有较大数量的生产，并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之中，特别是作为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3]（表一）。很显然，这些铜器代表了墓主较高的社会等级。当时的铜器特别是青铜容器首先是贵重的奢侈品，因为铜资源是远距离获取的复杂劳动产品，制作铜器又需经过复杂而高技术的生产。青铜容器等无疑也是被作为礼器使用的，因为限于当时的制作技术，这些容器无论是实用性还是外观都并不优于同类陶器。耗



图一 扶风庄白窖藏部分青铜器组合

费巨大社会劳动的珍稀品，除了作为财富，更显示了社会等级，完全具备了礼器的特质。

二里头文化时期铜容器虽然有爵、斝、盃、鼎等不同器类，但出现在墓葬中的往往是以单件的形式。日后大行其道的组合搭配尚未形成，作为礼器的铜器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而从材质上看二里头贵族墓葬随葬品，陶器和玉器也同样是作为礼器使用。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器用传统的延续，但铜器作

为礼器核心的地位则已建立。

以上所讨论从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形成，到西周中晚期礼器制度的成熟，器用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接下来我们观察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礼器，看看是如何向着成熟的方向发展。

表一 二里头遗址墓葬重要随葬品登记表

墓葬	陶器	玉器	铜器
81 V M4	盃		铃、牌饰
02 V M3	盃、爵	绿松石龙	铃
62 V M22	爵、觚		铃
80 III M2	盃、爵	钺	爵2、刀2
75 VI KM3	盃	戈	爵、钺、戈
75 III KM6	盃		爵
84 VI M6	盃	柄形器	爵
84 VI M9	盃2	柄形器	爵、斝
84 VI M11	盃2、爵	柄形器	爵、铃、牌饰
84 VI M57	盃	戈、柄形器	爵、刀、铃、牌饰

二 礼器的组合

二里冈文化在广袤的地域范围内表现出高度一致的文化面貌,说明了二里冈文化时期文明都有相当的发展高度。这一时期政治和地域中心都已经出现规模宏大的宫殿式建筑和城址,体现出早期国家权力所展示的仪式感。那么,二里冈文明礼仪活动中的礼器,是如何进行社会表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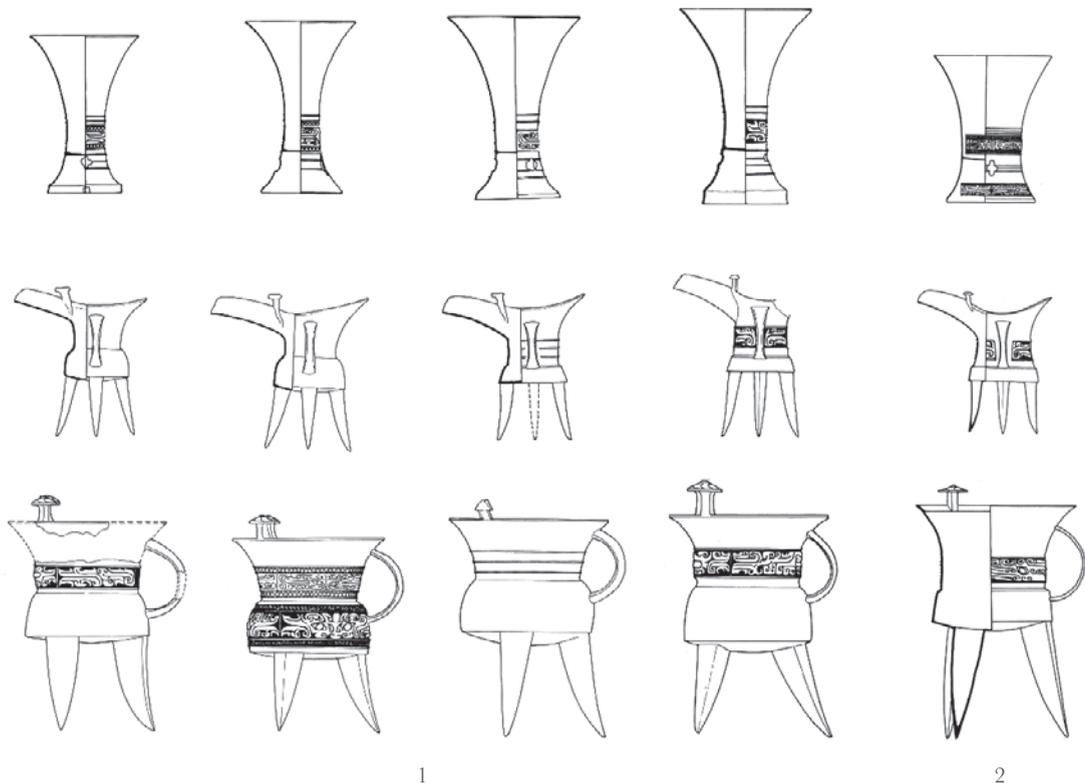
二里冈文化早期,青铜器生产较二里头文化时期还没有根本性突破。至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郑州商城和盘龙城都有规模较大的铸铜作坊。青铜器类别增多,包括有觚、爵、斝、尊、罍、壶、盃、鼎、方鼎、鬲、甗、簋、孟、盘等十几种,青铜器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使青铜器的器用方式存在更具仪式性的可能。

在盘龙城,墓葬规模与随葬品的类别及丰富程度协调一致,比较清楚地反映了不同等级的存在。李家嘴是一处高等级墓地,李家嘴 M2 墓葬规模在盘龙城——也是迄今二里冈文化时期最大,甚至还随葬有 3 具殉人;李家嘴 M1 墓坑虽然被破坏,然从其所在位置及出土随葬品可知其规模应与 M2 相近。李家嘴 M1、M2 随葬品也最为丰富,两座墓葬墓主无疑应该是当时盘龙城最高首领。在杨家湾,随葬兽面纹大圆鼎的 M11,墓主也应该是稍晚时间盘龙城的最高首领。在其他墓葬中,青铜器、玉器和硬陶明显只出现在规模较大的墓葬和随葬品总体较丰富的墓葬中,青铜器与墓葬规模关系最为密切,其数量的多寡与墓葬的大小相关,而小型墓葬中一般不见青铜器,或者只是偶见刀、戈等非容器器类。

表二 盘龙城墓葬随葬青铜容器登记表

墓葬	酒器	食器
李家嘴 M2	觚、爵 4、斝 3、尊、盃	鼎 6、鬲、甗、簋、盘、
李家嘴 M1	觚 4、爵 3、斝 5、壶 1、尊 2	鼎 2、鬲 2、簋 1、盘 1
杨家湾 M11	觚 4、爵 4、斝 4、尊 3、	鼎、簋
杨家湾 M4	觚 2、爵 2、斝 2、尊	鬲
杨家嘴 M2	觚 2、爵 2、斝 2	
杨家湾 M5	觚、爵、斝 2	
楼子湾 M4	爵、斝 2	鼎、鬲
杨家嘴 M1	爵、斝 2	鼎
杨家湾 M17	觚、爵、斝、尊	
楼子湾 M3	觚、爵、斝	鼎
杨家湾 M7	爵、斝、尊	鬲
杨家湾 M9	觚、爵、斝	
楼子湾 M5	觚、爵、斝	
楼子湾 M6	觚、爵、斝	
楼子湾 M1	爵、斝	鼎
杨家湾 M6	爵、斝	鬲

具体到随葬多件青铜器的墓葬中,在盘龙城保存较为完整的墓葬中,随葬青铜器情况如表二^[4]。不难看出,墓葬的等级差别是通过青铜器组合及其数量的不同来体现的。如果我们将容器从功能上分为酒器和食器两大类的话,会发现酒器的出现数量更多,出现频率也比较稳定。同时,酒器在不同器类之间的搭配也比较固定,并且形成较一致的套数,它们应当指示着不同的身份等级。酒器中觚、爵、斝是最常见的搭配,觚、爵、斝或者爵、斝在不少墓葬中均为单套组合,组合情况比较整齐,应当是代表身份等级不高的贵族。在酒器数



图二 盘龙城杨家湾M11、楼子湾M3觚爵斝组合对比
1.杨家湾M11出土 2.楼子湾M3出土

量较多的墓葬中，觚、爵、斝的件数开始部分或成套增加，其套数整齐者，有两套和四套的组合形式，它们指代的地位等级较高。在级别较高的酒器组合中，除了觚、爵、斝之外，一般还增加有尊或壘^[5]、壶、盃等，不过这些器类多是以单件的形式出现。尊有时一次出现多件，较为特别。无论如何，这些不同但有序的器物组合情况，说明礼器的使用仪式感十足，器用方式远较二里头文化时期成熟。另一方面，盘龙城这种以酒器为主的组合，与安阳时期青铜器组合特征相同，即“重酒的组合”^[6]，觚爵斝为基本组合形式、觚爵斝的套数是判断等级变化的一个主要指标。试对比杨家湾 M11 使用四套、楼子湾 M3 使用一套觚爵斝，在礼仪场合有着一望可知的差别（图二）。

三 礼器的体量

觚爵斝的套数指示使用者的等级，加之如表二所示酒器居于多数的情况，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明酒器已经成为当时礼器器用的核心、而食器只是居于次要的地位？或者说，当时是否还有其他体现不同等级的方式？

表二表明，盘龙城大型墓葬中会出现多件食器，如鼎、鬲、簋等，特别是鼎往往出现多件。此外，在一般墓葬中鼎也会以单件出现，可见鼎在食器中处于较特别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鼎在大型墓葬中的体量明显较大^[7]（表三），并与同类器形成较大的体量差异（图三）。其他器类都不会有这样明显的差异，说明鼎之大小与等级高低的关联，这时已经存在。可以设想，在祭祀等典礼活动中，高等级贵族使用大体量鼎，所展示的视觉效果无疑是突出而

引人注目的。这一点可继续对比杨家湾 M11 与楼子湾 M3 展现全套礼器的情形(图四)。由此也可见,大型鼎在高等级器用中,是处于真正核心、突出的地位。

表三 盘龙城青铜鼎体量登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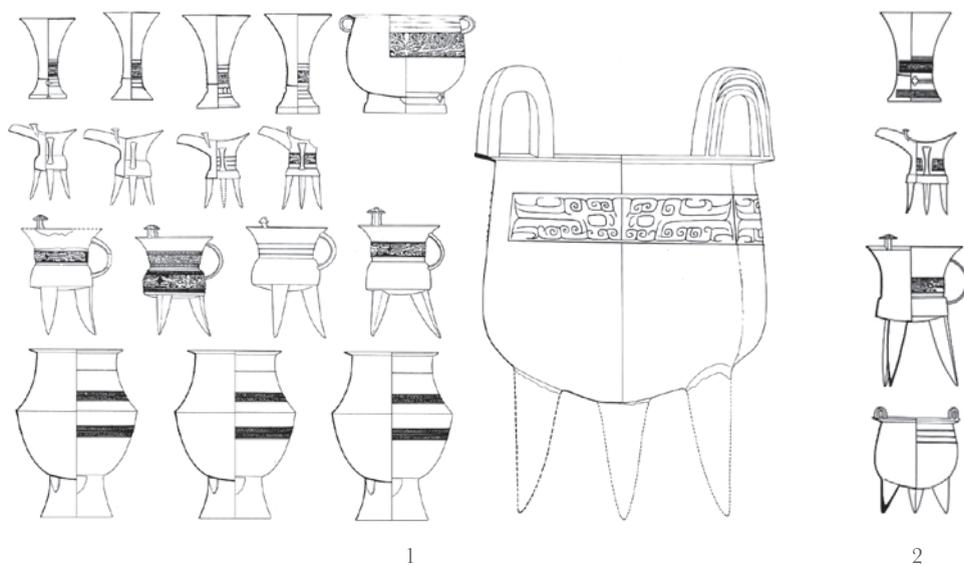
项目	口径(厘米)	通高(厘米)	重(千克)
杨家湾 M11:16	55	残	
李家嘴 M2:36	31.6	55	9.6
李家嘴 M1:1	28.5	45	9.9
杨家湾 M4:2	12.4	19.2	0.6
西城垣 M1:6	17.2	23.4	
楼子湾 M3:1	15	18	1.15

不只是盘龙城,郑州商城也使用超乎寻常的大型方鼎和圆鼎。郑州杜岭张寨南街窖藏出土方鼎(DLH1:1)通高100厘米,重86.4千克;向阳食品厂窖藏出土圆鼎(XSH1:1)通高77.3厘米,重33千克^[8]。在稍晚的中商文化时期,类似的大型兽面纹鼎在济南大辛庄、平陆前庄等多地都有发现^[9],显示有特殊的地位。

但是,铸造大型青铜器需要更高的技巧和经验,盘龙城的大型鼎往往带有大的铸造缺陷。李家嘴 M1:1 鼎三足基本都是补铸而成,杨家湾 M11 鼎出土时部分底部和全部三足缺失。鼎的铸造缺陷出现在底部和足部,应该和鼎倒立铸造相关。这些缺陷暗示高级贵族对于



图三 杨家湾M11:16与李家嘴M2:35鼎



图四 盘龙城杨家湾M11、楼子湾M3青铜器组合对比
1.杨家湾M11出土 2.楼子湾M3出土

超级大鼎的追求已经超出了作坊的技术能力。

相较于食器，酒器的体量一般没有明显的差异。觚爵斝等酒器均较小，例如觚高度一般在 20 厘米以下，爵在 15 厘米左右，斝略大，高也在 25 厘米以下。这些酒器在不同级别墓葬中大小区别一般在 5 厘米以下，不具备视觉上的明显差异。这说明，酒器和食器在器用中具有不同表达方式。

块范法铸造技术是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生产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技术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形成，并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准。盘龙城青铜器器形规整，几乎不见错缝的现象。李家嘴 M2 : 36 觚，器壁较薄处厚度在 0.2 厘米左右。该觚器高达到 36 厘米，从口部到器足合范一直保持着均匀的状态。从技术角度而言，制成如此极薄的器壁难度很高。而器体轻薄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突出特征，这一特征是基于技术的还是资源的？

实际上，盘龙城也生产器体颇为厚重的青铜器。如李家嘴 M2:1 簋高 23.8、口径 23.6 厘米，但其重达 5.15 千克，远大于体形稍小而重量在 1 千克左右的斝。李家嘴 M2 : 15 钺宽 26.7 厘米，重 3.85 千克，也是重器。总体而言，李家嘴 M2 各类青铜器都较为厚重，可见资源分配当然也是在礼仪中有所考虑的。其他墓葬器形较小而轻薄，可能有青铜器原材料不足的原因。长江中下游地区铜资源的大量开发约在中商文化时期，该地区出土青铜器普遍高大，或者也和这一背景相关。

四 礼器的装饰

几乎在任何社会，装饰都是在礼仪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处于青铜器发展滥觞时期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几乎谈不上装饰，大部分器物表面并不光洁，只有少数器物装饰有并不规整



图五 盘龙城装饰多周纹饰的青铜器（李家嘴M1罍与壶）

的阳线纹饰，不过这些简陋的特征显然是局限于当时的铸造技术。当我们看到二里头文化青铜牌饰，就立刻明白当时不仅有强烈的青铜装饰追求，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生产发展的同时，青铜器装饰也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一时期青铜器器表光洁，表明脱范技术明显提高。青铜器纹饰种类也较繁多，有兽面纹、夔纹等动物性种类，也有圆圈纹、人字纹、云纹等几何形种类，不同纹饰又有阳线、宽带的不同表现手法。主要纹饰兽面纹线条峻峭，兽面纹中的兽目凸出较高，兽面纹充满力度感。这使得青铜器器表的装饰性和观感都很强，体现出二里冈时期对于青铜礼器外在形式的追求。

在尊、罍、壶等器体较高的器类上，装饰多周不同的纹饰——这也是青铜器纹饰按周、单元来布置装饰的开端。这其中，兽面纹一般都是居于主体位置，占据主要幅面。夔纹一般都是作为次要纹饰，装饰在稍小的区域，比如尊罍的肩部。圆圈纹、弦纹往往作为兽面纹上下陪衬式装饰，仅仅分布在很窄的范围内（图五）。因此，不同纹饰所占地位不同，兽面纹在装饰中显然是最为重要的。

以兽面纹的地位来观察不同器类，可以注意到这些器类所处的地位。二里冈文化时期绝大部分青铜容器都装饰兽面纹，盘龙城青铜器也是如此。不过可以注意到，甗、鬲等炊煮类器物几乎都不装饰兽面纹（图六），暗示这些器类在食器中居于辅助性地位。大型鼎地位突出，且都装饰兽面纹。而体量很小的鼎则往往饰简单的弦纹。杨家湾 M4:2、楼子湾 M3:1 鼎口径和高度都不超过 20 厘米，都装饰弦纹。李家嘴 M2 随葬鼎多件，最小的 M2:37 扁足鼎口径 11.6、通高 17.6 厘米，也只是装饰弦纹。这些情况表明，装饰是器物重要性的一个标识。二里冈文化时期之后装饰在青铜礼器中继续发



图六 盘龙城装饰低等级纹饰的甗与鬲（李家嘴M2甗、李家嘴M1鬲、杨家湾M4鬲）

展，体现了礼器外在形式上追求的方向。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装饰奠定了青铜时代青铜器的许多基准，而装饰所表达的礼仪性则应该是这一时期所开创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综上所述，盘龙城所代表的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以器物组合、大小体量、装饰类别等不同方式，来展示、体现青铜器拥有者的身份和等级，充分说明青铜礼器及其器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五 从礼器看盘龙城的衰落

与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盘龙城聚落一直是以盘龙城城垣为核心不同，我们认为聚落核心区在不同阶段经历过位移。过去的考古工作表明，盘龙城第一、二期遗存多分布在南部的王家嘴一带，此时盘龙城城垣尚未形成，这是盘龙城的初始发展阶段。盘龙城遗址第三期开始有大型建筑和青铜器墓葬，第四、五期出现城垣，并在城垣东北分布有一、二号宫殿，宫殿区之东有包括李家嘴 M1、M2 的墓地，这是盘龙城的兴盛阶段。盘龙城第六、七期的最晚阶段，杨家湾岗地成为聚落核心区，岗地南坡分布有大型墓葬如杨家湾 M11、M17，这是盘龙城的衰退阶段^[10]。盘龙城聚落不同发展阶段展示出一个城市兴衰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些阶段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也得到了印证^[11]。

盘龙城城市的兴衰，在青铜器的器用上也有体现。在城市的初兴阶段，聚落规模不大，当时青铜器生产也有较大局限，目前尚未发现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在兴盛阶段，李家嘴 M1、M2 青铜器数量多，器形厚重高大，体现出较高的社会等级与地位。那么，城市最后的衰退在墓葬青铜礼器中又有怎样的反映？

属于衰退阶段的杨家湾 M17 墓葬长度近 3 米，随葬有大型兽面纹牌饰以及镶嵌绿松石金饰，后者也是中原文化系统中所见最早的成形金器，M17 墓主应该是当时盘龙城最高首领。不过，M17 青铜容器只有爵、斝、觚形器、尊各一件，约相当于一套觚爵斝组合，这是随葬青铜礼器数量最少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在杨家湾北坡的不少墓葬，规模较大而随葬青铜器数量不多，是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

另一座属于最高首领的墓葬是前述的杨家湾 M11，该墓青铜器数量较多，但制作粗略。如前所述，兽面纹大鼎可能是一件铸造失败的产品。M11 多件酒器形制简略，在纹饰类别上也多使用弦纹等辅助性纹饰（图四）。该墓 4 件爵中只有一件装饰兽面纹，其他 3 件或素面，或饰简单的弦纹，一件斝也装饰同类器少见的弦纹。M11 尊颇为轻薄，肩、腹装饰两周圆圈纹。前已述及，圆圈纹主要是作为陪衬的次要装饰。

杨家湾 M11、M17 青铜器呈现出的衰落气象，与当时的聚落局面一致。衰退阶段作为核心区的杨家湾南坡不同功能区、不同等级建筑缺乏布局。墓葬或混杂于居住区，或分布在聚落外围。此时期的聚落显得拥挤而较混乱，直至最后被废弃。

总的看来，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器以组合方式、数量与体量、装饰等不同形式，表达礼器拥有者的社会地位。这些形式已具备了礼器制度成熟时期的基本表达方式，同时也说明二里冈文化晚期青铜礼器的外在形式已经基本成形。不过，这一阶段礼器中具有重要礼仪意义的文字尚未出现，装饰或造型风格一致的成组现象也未形成，更缺乏西周中晚期器用中那种秩序感，与成熟的礼器制度还有较大的发展距离。

注释：

- [1] 邹衡、徐自强在《整理后记》中谓西周中期“可能对礼制进行了一番改革，……从而在铜礼器上逐渐形成了一套不同于殷礼的新制度”。参见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07-208页。
- [2] 图形根据 Jessica Rawson, *Western Archaeology*, Michael Loewe, Edward L. Shaughnessy editor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77.
- [3] 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并非都是青铜器，不过经过检测的铜容器则都是青铜材质，说明二里头人已经认识到合金的优越性。
- [4] 本文涉及盘龙城墓葬与青铜器材料，来自以下文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一九六三—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武汉市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3期。
- [5] 尊、罍是功能近似的酒器，在盘龙城，两类器的器形也很难区分。
- [6]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
- [7] 李家嘴 M2:36 鼎的口径在盘龙城发掘报告中为31.6厘米，在1976年第2期的简报上、《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册上都作35厘米，差别较大。
- [8] 两件方鼎、圆鼎分别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年—1958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94、797页。
- [9] 张昌平：《论济南大辛庄遗址 M139 新出青铜器》，《江汉考古》2011年第1期。
- [10] 张昌平、孙卓：《盘龙城聚落布局研究》，《考古学报》2017年第4期。
- [11]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2012—2017年盘龙城考古：思路与收获》，《江汉考古》2018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姜舜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征订启事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学术性刊物，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主要栏目有考古研究、青铜器研究、佛造像研究、钱币研究、陶瓷器研究、玉石器研究、舆服研究、书画研究、舆图研究、墓志碑帖研究、文献典藏研究、近现代文物研究、近现代人物研究、馆藏文物研究、文物保护等。

刊物为月刊，国际标准大16开本，160页码，全彩精印，每期28元，全年定价为336元（含邮费）。

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2-229；也可通过银行汇款订阅。

收款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汇款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16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

邮 编：100006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0709089137287

联系人：高 聪 (010) 65119510 13810075439

汇款时请在附言中写清汇款人单位、姓名、详细地址、邮编、电话、刊期、份数，并保存好汇款凭据。若未收到刊物，请凭汇款凭据复印件查询。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编辑部